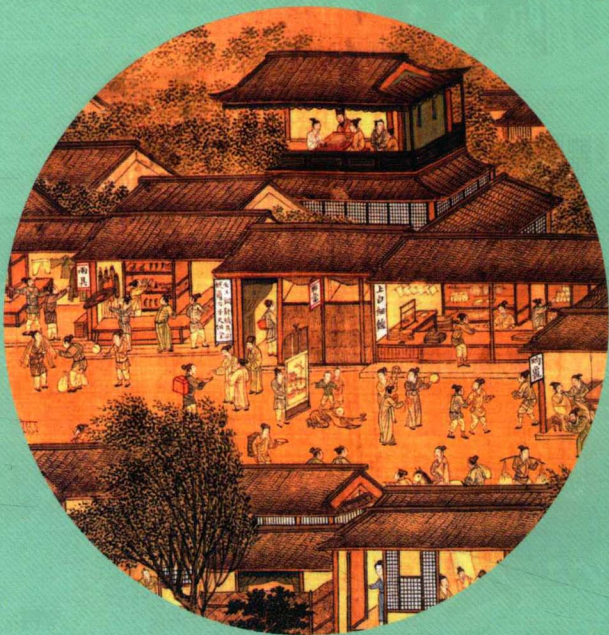


巫仁恕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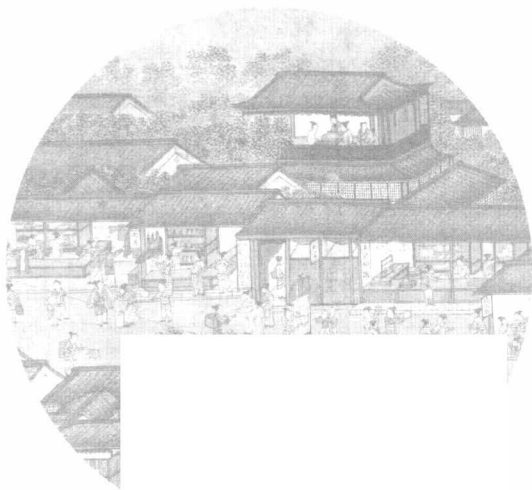


優游坊廂

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

中华书局

巫仁恕
著



優游坊廂

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巫仁恕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7.10
ISBN 978-7-101-12540-5

I.优… II.巫… III.文化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K248.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8774号

书 名	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
著 者	巫仁恕
责任编辑	王 亮 王 芳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 $\frac{1}{8}$ 插页 2 字数 29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2540-5
定 价	42.00 元

目 录

导 论	1
-----------	---

上篇 休闲消费与城市空间的改造

第一章 休闲设施与城市空间的变化	27
第一节 休闲游观	28
第二节 声色之娱	35
第三节 闲饮适意	47
第四节 斗赌争胜	58
第五节 休闲空间的变化	66
小 结	77
第二章 休闲购物与城市景观的变化	79
第一节 城市商业中心与商店街道的形成	80
第二节 商店的结构与功能的变化	96
第三节 视觉广告与城市景观的变化	120
小 结	136

中篇 休闲空间变迁的社会意义

第三章 城市私家园林的公共化	141
第一节 明清江南城市的筑园风潮	143
第二节 江南城市园林与城市空间	155
第三节 社会的观感与批评	169
第四节 园林的开放与市民空间	176
小 结	187
第四章 旅游空间的演变与社会分层化	193
第一节 大众游观活动的兴盛	194
第二节 游观活动的空间变化	197
第三节 士大夫与旅游空间的开发	210
第四节 晚清苏州旅游空间的退缩	223
小 结	229

下篇 性别与消费空间的区分

第五章 明清妇女的休闲消费空间	235
第一节 妇女的休闲活动	236
第二节 妇女的消费与购物	249
第三节 妓女的角色与作用	269
小 结	287

第六章 士商的休闲消费与男性特质	290
第一节 士大夫对妇女休闲消费的偏见	293
第二节 士大夫的休闲旅游与男性特质	298
第三节 士大夫的购物行为与男性特质	306
第四节 士商共享的男性消费文化	319
小 结	337
结 论	339
附 录	354
征引书目	376
后 记	408

图表目录

图 1.1	明人绘《南都繁会图》中观戏的局部	38
图 1.2	《清明上河图》摹本中观戏的局部	38
图 1.3	清代苏州戏园	40
图 1.4	明人摹《清明上河图》中的青楼	44
图 1.5	清人徐扬绘《姑苏繁华图》中的苏州浴堂	57
图 2.1	《洪武京城图志》之街市桥梁图	82
图 2.2	明清时期南京城街道桥梁地名示意图	88
图 2.3	明初南京市场分布	89
图 2.4	明中叶以后南京的市场与商店街区	90
图 2.5	清代南京市场与商店街区	95
图 2.6	北宋张择端绘《清明上河图》中的店铺	99
图 2.7	北宋张择端绘《清明上河图》中的酒店	99
图 2.8	北宋张择端绘《清明上河图》中的药铺	100
图 2.9	明人绘《南都繁会图》中的店铺	100
图 2.10	明仇英摹《清明上河图》中的店铺	101
图 2.11	清人徐扬绘《姑苏繁华图》中的店铺	102
图 2.12	明代小说《警世通言》中的绒线铺插图	108
图 2.13	明仇英摹《清明上河图》中的成衣铺	112
图 2.14	清人徐扬绘《姑苏繁华图》中的罗圈幌子	122
图 2.15	明人绘《南都繁会图》中旗竿布帘式的幌子	123
图 2.16	明人绘《南都繁会图》中的招牌	125
图 2.17	清人徐扬绘《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图》中的冲天式招牌	128
图 2.18	清人王原祁绘《万寿盛典图》中的冲天式招牌	129

图 2.19	清人徐扬绘《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图》中的北京招牌	131
图 2.20	清人徐扬绘《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图》中的北京店铺正面招牌	132
图 3.1	苏州城内明代园林分布	159
图 3.2	苏州城内清代园林分布	160
图 3.3	乾隆《姑苏城图》中的田地分布	164
图 3.4	苏州阊门外城郊图	168
图 4.1	苏州城内庙会市集的分布	205
图 4.2	传明人沈周所绘《苏州山水全图》局部	212
图 4.3	传明人沈周所绘《苏州山水全图》所显示之苏州城郊与 城外风景区	213
图 5.1	《吴姬百媚》所绘之名妓春游与泛舟图	279
图 5.2	山塘河水系示意图	286
表 3.1	明代苏州城内园林	189
表 3.2	明代苏州城郊园林	190
表 3.3	清代苏州城内园林	190
表 3.4	晚清苏州城内园林	191
表 3.5	清代苏州城郊园林	192
表 6.1	《吴尚贤分家簿》中物品的价格	329
表 6.2	《张应辉等立阊书》中物品的价格	330

导 论

中国大陆自从 1980 年代走向改革开放后,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几乎都呈两位数的增长。巨额的商品交换不仅意味着物资的流通,而且还滋养了个人的消费欲望和新的社会网络。尤其是对城市居民来说,从经济改革中所获得的经济效益异常显著,就从 1980 年代初到 1990 年代末这二十年而言,城市居民有了新的通讯方式、新的社会语汇,以及新颖的休闲方式。1990 年代末已有西方学者断言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消费革命^①。果然当时有新闻就指出:中国将在 2012 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②。许多世界名牌拟在中国大陆的一级城市登陆,背后的动机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国内的消费市场,已经成为世界奢侈品销售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再从区域经济的发展来看,从 1979 年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三十年中,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也就是传统称为“江南”地区的

① 戴慧思(Deborah Davis)主编,《中国都市消费革命(*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页 1—3。

② 关于当代中国消费力的崛起,以及其消费行为与消费观念的变化,还可以参见 Karl Gerth, *As China Goes, So Goes the World: How Chinese Consumers are Transforming Everything*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10)一书,中译本为葛凯著,曹槟译,《中国消费的崛起》(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经济发展最为迅速。该地区的面积和人口虽然分别仅占全中国总数的1%和6.2%，但该地区在2004年的GDP却占到全中国的六分之一，人均GDP超越全国平均值的1.4倍，且年增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①。由此可见，在今天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中，江南扮演着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角色。不仅如此，从近年来中国城市竞争力的排行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江南地区的大城市，尤其是上海、南京、杭州、苏州等地，其居民消费指数都遥遥领先其他地区的城市。尤其是对化妆品、电子通信设备等高价消费品，该地区居民有相对更高的购买力^②。

造就今日江南经济奇迹与城市居民消费革命的原因，如果从历史的角度作观察的话，其实可以从明清时期江南的消费现象看出一些端倪，也就是说，当今的现象其实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③。本书即探讨明中叶以后至清中叶，江南城市居民的休闲性消费活动。所谓的休闲性消费活动，系指人们在闲暇时的消费活动。这样的消费活动是在城市内与其周边发生，势必会与城市的空间结构产生互动，

① 董增川，《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进程水问题及对策思考》，《中国水利》，2004年第10期，页14—15；谭晶荣等，《产业转型升级水平测度及劳动生产效率影响因素估测——以长江三角洲地区16个城市为例》，《商业经济与管理》，2012年第5期，页72—81。

② 倪鹏飞、谢海生，《中国城市竞争力2009年度述评》，《综合竞争力》，2010年第3期，页26—33；林阳，《我国各地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因子分析模型及结论分析》，《中国市场》，2012年第2期，页91—92、116。

③ 李伯重从经济史的角度来探讨此现象与近代早期历史的关联性，参见李伯重，《“江南经济奇迹”的历史基础——新视野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页68—80。

那么休闲消费如何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新形成的消费空间又如何反映社会关系呢？这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主题。

在进入正文之前，必须先面对过去研究明清城市史的两大问题：其一是什么是城市性，另一则是促使明清城市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城乡一体 vs. 城乡分离

西方学者在探讨中国历史上的城市时，很难摆脱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的观点。韦伯的解释框架中，系以探求西方资本主义城市的起源与特性为目标，他将现代城市的演化发展溯及古代社会。他认为，要发展成一个城市共同体，聚落至少得具备有贸易与商业的性格，此外，还要有下列特征：(一)防御设备；(二)市场；(三)自己的法庭，以及至少局部自治的法律；(四)相关的社团组织；(五)至少是部分自治与独立，市民可以某种形式参与市政^①。这是西方城市由上古至中古时期发展出来的特色^②。但是他认为中国并未具备上述的特征，因为中国城市内的社团组织，以及区别乡村的“市民概念”从未存在。中国城市居民在法律上仍属于其家庭和出生的村庄，城市没有自主的法律与自己的法庭，市民更没有参与市政的机会，所以中

① 韦伯著，康乐编译，《经济与历史：韦伯选集(IV)》(台北：远流出版，1990)，页214。

② 令读者纳闷的是，韦伯的叙事没有超过中世纪时期，对中国城市的论述也没有明确的时代。

国完全没有符合上述西方城市共同体的标准^①。韦伯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自治城市的发展,主要的障碍来自于皇权。所以整个中国历史上,城市一直是地方行政的中心,或具有军事驻防的政治功能^②。

韦伯关于中国城市性质的观点,主要是为了其欧洲城市发展的思想提供一个参照对象而提出的;实则西方学界已在理论上批判韦伯的城市理论,尤其是韦伯论东、西方城市形态不同的这方面^③。如学者对于西方城乡分离的说法,已有新的看法。英国学者 E. A. Wrigley 从城市体系、农村提供城市粮食以及农村提供城市移民与劳动力等方面,说明西方的城乡也是连续一体的,而非分离的^④。

然而韦伯的论点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60 年代,对西方研究中国史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里的专家影响极大。西方研究中国城市的史学家也有不少突破其论点的研究成果,诸如找出不同于韦伯假设的实例,指出宋代以后中国城市仍有持续的发展,反驳其以为自此中国城市发展停滞不前的说法。再如韦伯过度强调中国城市的行政功能一说,也有大量的研究指出中国城市具有经济作用^⑤。同时中国城

① 韦伯著,康乐编译,《经济与历史:韦伯选集(IV)》,页 215、216。

② 同上书,页 217、266—267。

③ 参见 Vatro Murvar, "Some Tentative Modifications of Weber's Typology: Occidental Versus Oriental City," *Social Force* 44 (1966): 381—389.

④ 参见 E. A. Wrigley, "City and Country in the Past: a Sharp Divide or a Continuum?" *Historical Research* 64, 154 (1991): 107—120.

⑤ 有关这方面的检讨,William Rowe 的作品最具反思能力。参见其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一书之导论。

市的多样性面貌与多元性形态也不断地被挖掘出来。

在西方研究明清城市史的方法论上,受到韦伯影响而衍生的重要论点,就是所谓城乡连续一体的议题,代表性的人物是学者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他主张,和工业化以前的欧洲相比,传统中国的城市与乡村之间是相互开放的,并没有明显地隔绝开来。城乡之间是连续一体的,无论是建筑形式、生活方式、衣着款式等方面,城乡之间并无不同;甚至精英分子对城乡的态度、经济活动的市场区与商业集中地,以及文化活动之结构与特性都不只限于城市内^①。

直到最近的研究仍不乏有倾向牟复礼的观点者,如科大卫(David Faure)与刘陶陶合编的论文集 *Town and Country in China: Identity and Perception*,即主张明清时期当时人们心理并未意识到城乡的区分有何重要;直到20世纪政治改革运动兴起,城镇成了社会变迁的代言人,而乡村则被视为落后的根源。甚至认为要在传统时期探寻城市的传统,终究是时代错置^②。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强调晚明以来城市的特殊性。如许亦农关于苏州的研究,试图指出城市内宗教建筑在功能上的多样性,显示与乡村有明显有别。又如费丝言透过晚明南京徭役改革的研究,呈现了城市作为一

① F. W. Mote, "A Millenium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 Form, Time and Space Concepts in Soochow," *Rice University Studies* 58. 4 (1973): 101 - 154;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 1350 - 1400," in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103 - 116, 117 - 119.

② David Faure and Tao Tao Liu eds., *Town and Country in China: Identity and Perception* (New York: Palgrave, 2002), 1, 14.

个课税的重要空间,明显与乡村区隔开来^①。

总而言之,中国历史上的城乡关系是一体或分离的问题,成了日后西方学界研究中国城市史必定要问的问题,但也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唯有充分说明城市与乡村究竟有何差异,也就是所谓的城市性格(urbanity)是什么,如此才能合理化研究城市史的必要性,也才能让城市史这块领域具有主体性。

如何分析城市有别于乡村的不同特性呢?社会学的研究取径有助于我们思考历史的问题,如德国的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在《大都会与心灵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一文中,试图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指出独特都会生活的普遍特征。他认为,19世纪以后的都市化将人们的个性从传统社会的支配形式中解放出来;他又说:“街道纵横,经济、职业和社会生活发展的速度与多样性,表明了城市在精神生活的感性基础上,与小镇、乡村的生活有着深刻的对比。”^②新的都会生活方面却又具有双重面向,一方面是日渐客观和理性化,另一方面则是过度的外在感官刺激^③。受到他影响的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沃斯(Louis Wirth)在《都市主义是一

^① Yinong Xu, *The Chinese City in Space and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Form in Suzhou*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173-176, 180-190; Si-yen Fei, *Negotiating Urban Space: Urbanization and Late Ming Nanj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9), 29-75.

^② 中译参见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页132。

^③ 西蒙·帕克(Simon Parker)著,王志弘、徐苔玲合译,《遇见都市:理论与经验》(台北:群学,2007),页19-21。

种生活方式》(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中也指出都市环境的人口规模、居民密度与多元社群生活的异质性,使得城市的生活经验有别于其他的地方。所以他认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城市定义,“是试图凸显城市社群生活模式的要素”^①。

虽然上述的观点是奠基于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的都市社会研究,但两者都强调城市的生活经验或生活方式有别于乡村,而这样的特殊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近代早期的城市,我们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明清城市的特殊性。即使是强调城乡连续一体的牟复礼也承认:在明清时期,确实有一些态度与特点,是与城市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城市里的人较乡下人能够享受到更多彩多姿与更具刺激性的生活,能够知道与获取更多的远地产品,能买到更高级的手工业制品,也能与政府行政部门作较直接的接触。因此城市居民的确存在着某种的“城市傲态”(city attitude)^②。

我们从当时城市居民在穿着与服饰款式上的态度,可以感受到他们自觉相对于村民的优越感。如嘉靖《宣府镇志》中记载:“城市中,绝无男子服裨衫两截者,有之则众笑曰‘村夫’;绝无妇人戴银簪珥者,有之则众笑曰‘村妇’。”^③“村夫”与“村妇”这样的称呼是带有讽谕性质的词语,反映出城市居民自觉在服饰的消费方面是很前卫的,

① 中译参见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城市文化读本》,页 143;另参见西蒙·帕克著,王志弘、徐苔玲合译,《遇见都市:理论与经验》,页 63—64。

② F. W. 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 1350—1400,” 106.

③ 嘉靖《宣府镇志》(明嘉靖四十年刊本抄补本),卷 20,《风俗考·政化纪略》,页 90a。

而贬抑乡村农民的服装是落伍的。笔者以为,城市提供了购物消费的便利与多元的娱乐活动,造就城市成为流行时尚的中心,正是构成城市生活不同于乡村生活的特点之一。近年来王正华有关晚明城市风俗图的研究也指出,城市风俗图中充满许多市场、娱乐、商店、购物等活动,反映了当时人对城市印象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消费性格^①。

都市化与城市发展史的动力

因为自秦朝统一中国、实施郡县制度之后,城市的规模已规格化,唯独首都为全国最大的城市。于是城市史的研究自然聚焦于史料最丰、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的首都城市。有关首都城市的规划、城墙的规模、居民人口的数量与分布,以及城市管理的相关制度,就成为城市史研究的焦点。然而,城市到宋代以后的发展,因经济发展的动力,促成一波城市化的现象,学者称之为“中古的城市革命”(Medieval Urban Revolution)^②。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前代的坊市制度崩解,使得商业贸易的机能不断地加强;亦即城市除了行政与军事的

^① 参见王正华,《过眼繁华:晚明城市图、城市观与文化消费的研究》,收于李孝悌主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5),页1—57;《乾隆朝苏州城市图像:政治权力、文化消费与地景塑造》,《“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50(2005年12月),页115—184。

^②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175—177.

功能之外,它的经济功能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①。

中古的城市革命又带出了两个重要的争论性议题,一个就是宋代以后都市化发展是停滞还是持续发展的争论,另一个则是明清时期兴起的小市镇应该算是城市还是乡村的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的起源,在于有学者主张南宋之后至19世纪之间,中国城市人口数量增加缓慢至极点(10%以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数长期下降,城市人口不集中向大都市而在小市镇^②。但近年来的研究已经显示,明清城市化是持续上升的,尤其是江南的城市化持续发展,学者重新估计江南城市人口比重在17世纪约15%,到18、19世纪成长到19%至20%^③。以苏州府为例,明清苏州的城市人口增加2倍,市镇人口增加9倍。城市化的现象反映在城市景观的变化,包括城市内建筑密度加大而有侵街、河道堵塞,人口由城内扩展到城外的关厢;其下郊

① 刘石吉,《城郭市廛——城市的机能、特征及其转型》,收于刘石吉主编,《中国文化新论·经济篇·民生的开拓》(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页322—325。

②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177—178. 赵冈、陈钟毅,《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食货月刊》复刊,卷13期3—4(1983),页9—31;赵冈,《论中国历史上的市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2期,页5—18。

③ 李伯重估计明代后期1620年江南城市人口比例为15%,清代时则达20%。曹树基估计明代后期江南地区城市人口比例为15%,推算清代则为16.3%;龙登高修正清中叶江南的城市人口比例为19.2%。刘石吉估计江南苏州一府内的市镇人口,据乾隆《吴江县志》市镇人口数占总人口数35%。参见龙登高著,《江南市场史——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页56—58;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五卷 明时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页424—425;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 清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页757;李伯重著,《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页409—417;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思与言》,卷16期2(1978年7月),页26—47。